

刘瑞琳 主编

温故

叁辑

合订本

温故

回望历史的平台
陶冶心智的所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故(合订本叁辑)/刘瑞琳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633-7760-2

I. 温… II. 刘…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94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 邮政编码:101100)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40 字数:60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10年代的巫峡绝景

这张拍摄于八十多年前的照片，缘于一条铁路的修建。1919年9月15日，它与别的照片收录在美国裕中公司向北洋政府交通部呈递的关于周襄铁路建设的可行性报告里。当时为了参证铁路入川之可行，裕中公司也曾请人对三峡的部分线路进行勘测，并拍摄了沿途的山川地形，以说明施工之艰难、成本之巨昂。今天看到的这几为绝版的照片，由铁路勘测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已经可见图上有氯化银或溴化银的洗照片痕迹，很偶然地为我们留下了长江三峡1910年代的壮丽景观。

(参阅“影像”《八十多年前的三峡景观》)

封面图片

燕京大学燕南园旧址今影。据记载，燕南园里住过这样的人：饶毓泰最先入住51号，1968年在住处自尽，后来江泽涵也入住过；52号，住过黄子卿、齐思和住过53号；54号，洪煊莲住过；冯定在55号住过多年，后陈岱孙从镜春园旧宅转住过来；56号，住过周培源；冯友兰住57号，终老于此；汤用彤住入58号，是马寅初任校长时的安排；60号，王力住过；62号，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住过；翦伯赞住64号，其家一尘不染，1968年在燕东园夫妇服安眠药辞世，那时两人已迁出燕南园自己的家；66号，吴文藻、冰心夫妇住过，后又有朱光潜入住，直至1986年故世。

(沈继光、高萍2006年摄于北京大学)

因此仅能按记忆所及，盖漏○星。字一叠目，计

共五十五页。重点是宋元明，大都比较空面

与利略。比之林玄历情资料生成高古生老，

有些已有照此成印字 批者
不占费力，大概即少以二印象，则取核。

在六年前
以本书编定，依资料若果二百页以上即制

版。未付印，在历情与能于存一信底子，故主

宋白而特资料至同 这信材料 是保序，可以看，对

工作为在生些应答兄中部海，难后首嘴，推

变数反。陈而大调，为已印出，将本也外只

查一份，供学习用，实源张衡。

书云，并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茅沈从文

二月三日

道医病院中则必不久，以不预用，手而

各科，学目字陈○就，读原谅，家。

书台。现代材料过多，而又而得，不

不用晚读，按书视而记及，整石南

沈从文手迹

(参阅“文本”《沈从文1971年致刘敦愿书简三封》)

目录

特稿

邵燕祥 1951年到甘肃 / 1

风物

张 琰 极司非而路40号 / 20

简 杨 河东河西 / 38

张洪浩 林泉老屋 / 42

回眸

周孜仁 当年的饮食文化 / 49

影像

张远航 八十多年前的三峡景观 / 61

聚焦

赵映林 毛泽东与胡适 / 70

人物

贺宝善 香港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黄丽松 / 81

顾训中 萧同兹这个人 / 88

记忆

周绍昌 西荒地夜曲 / 101

杨秉政 西出阳关 / 106

陈仁德 父亲的几个人生细节 / 119

访谈

李怀宇 范用：读书无禁区 / 123

文本

王任等 沈从文 1971 年致刘敦愿书简三封 / 136

程巢父 致黄克武先生信 / 147

1951年到甘肃

邵燕祥

小 引

我因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参加土地改革时的笔记本,回忆和反思那一段经历就有些依据了。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当时在“蒋管区”,却也在(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小组内学习讨论过。那时我已知道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因此,认为毛泽东讲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然则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也只是实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而已。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头脑,虽置身于国共两党决死斗争的格局之中,却没有了解此时此刻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根本没想到这是给同盟者以实际利益的重大举措,借以动员广大的贫雇农团结在保卫胜利果实的旗帜下,从兵源和物资两个主要方面支援前线,同时结束抗战中止于减租减息、容纳地主阶级联合抗战的局面,划清阶级阵线,孤立并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巩固后方政权。

我生于城市,在1947年以前没有下过乡,没有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有关农村生活的见闻都是从书本上看来或辗转得于传说。我想象中的地主,已经不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和鲁四老爷们,而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里的人物,还有古元、彦涵木刻里的形象。我们在讨论封建剥削的时候,一时对利滚利“驴打滚”叫不顺嘴,有人就解释说,就像欠人一

头骡子，还债时得算成大骡子下了小骡子，小骡子又下小骡子，加倍翻番；我们这些城市中学生闹不清骡子是绝后的。我们热烈地讨论，要理解《土地法大纲》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将比减租减息远为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消灭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过幸福生活。

我们的理解，在一般原则层面上是不错的。只是因为不知道当时试点已有的实践，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后果，预计达到的目的和始料不及的局面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这个背景不清，我们始终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的欢呼拥护。偶尔听到学校里或社会上对农村土（地）改（革）负面现象的议论，条件反射地断定为造谣诬蔑；有一个功课不错待人也无可挑剔的同学，家在良乡，经过土改，似是划为地主的家庭遭到“扫地出门”，家里便有成年人集结为还乡团反攻骚扰，他本人也因此仇恨八路军，并走极端，投向特务（或特务外围）组织。我起初因对他印象较好，不相信他这一选择，证实无误以后，对他是惋惜加上警惕，但我却没有从另一方面想想，土改中具体政策的制订或执行，是否发生了什么偏颇，在消灭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制度时，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有没有加以区别，对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一般家庭成员有没有切实给予生活出路，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革命运动的后遗症。这都是后来直到今天回首往事时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想法；这些想法其实也是中共领导群众运动曾经总结过的经验教训，曾经提示过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考虑，当时我们这些置身于事外者根本没有想到，而当时党的各级干部本来应该是想到，有些重大的偏差是应该防范于前、补救于后的。

而除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的讲话中稍涉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以外，多少年来公开的著述中，土改也如其他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只有成绩方面的正面陈述，而曾有的弯路、偏差、错误倾向直至侵犯了不该侵犯的人的利益，杀害了不该杀害的人，都很少提及，因而汲取教训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毛泽东晋绥纠“左”的一年多以后，进了城，建了国，1949年至1950年那个冬春，北京郊区和各个“新（解放）区”就都搞了土改试点。1951年全面铺开。不过，三大运动中的这一大运动，要利用冬闲时间，以免妨碍农业生

产，所以比年初已经大张旗鼓的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稍稍滞后了些。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也有参加土改的名额，不需报名，上级决定有我。跟我一起去西北土改工作团的，还有行政处的蔺际成（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党员），北京市台的茹健（原北平某大学的地下党员）。后来，老蔺在50年代调出电台，茹健在“文革”中自杀了，当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因为他没有任何罪愆；只有蒋介石国民党会认为他有罪：他可是从年轻时就一心要革国民党的命了。

我们于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出发，此行延续到次年新春方回，前后三个多月。

一站一站地走向土地改革第一线

我是拥护土地改革的。即使我不是在1947年就学习过《土地法大纲》，我也知道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共产党人应该比孙中山更进一步，从理论进入实践。

我从彦涵的版画和赵树理的小说，看到过抗战时期解放区农民闹减租减息、地主节节后退的情态，又看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好像跟着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工作组下乡，经历了土改的全过程。那时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尚未出版，我还没有读过毛泽东针对晋绥和其他地区所作的，关于土改中政策问题，关于纠正土改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党内指示。

还在1949年前，偶尔听到关于解放区土改中除了对地主“扫地出门”以外，还施加一些酷刑的传言，都是充耳不闻，当作是逃亡地主甚至国民党特务的造谣，连“本质与主流”、“普遍与个别”、“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些常备武器都不必用，就可以做出判断，落得耳根清净，也最省心。

轮到参加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土改了，旧的《土地法大纲》已经重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切将有所遵循。1951年，就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土改工作团活动。我这次参加的，大概算是第二期，全国一共31个团，3658人；除天津组

成5个团外，中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和北京市各单位组建26个团，共3139人。我所属的西北两个团，共224人（党员40人，团员55人，约占四成），只比华北那一个团（131人）大些。其余如中南11个团，1300多人，西南、华东都是6个团，各700人左右。

那时我没有注意，现在回想，大概有个全国土改的领导机构，给我们作报告的都是其中的成员，如安子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是中央中央统战部部长。

10月10日，在中山公园，由安子文作思想动员报告。他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农民阶级起来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因此和平土改是不可能的（！）。他说，土改基本上是解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满足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故他们斗争最坚决，对地主阶级最不留情，要以他们为领导骨干。但贫雇农最不好发动。干部、知识分子，跟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格格不入，小资产阶级易于支持中农做领导骨干（！）。他又说，贫雇农中也不纯洁，有一些带流氓性，很穷，但不务正业，有些是地主的狗腿子；还有些虽非狗腿子，但脱离群众，企图贪污，不顾政策。一入村，老老实实的贫雇农不会找我们的，他们这些人却会找上来。最后，他说，上面下去的干部，有时先有一种调和妥协的思想，以后遇到问题又会“宁左勿右”，左右摇摆（！）。

这些意见应该说都是吸收了几年中土改试点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若看他在1948年划定的政策界限，还是比较稳妥的。然而，在政策执行中，有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批评“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偏差，但这往往是与坚决“依靠贫雇农”的宣传和实践分不开。有些过去试点工作中的做法，早已否定了的，但在干部中的影响还在；如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我曾写进一首小诗（《寄到一座铜矿山》，刊发在1955年的《新观察》），来说明在农村发动群众的广泛深入，老同志看了指出，这是1947年老区土改试点时一个“左倾”口号，产生过打击一大片的严重后果！想不到时过数年，竟还在一些土改干部口中流传。因此，尽管掌握运动的领导不断提醒，不要“左右摇摆”，包括警惕“宁左勿右”，

实际上却还是往“左”摇摆的时候居多，这就要从更深处去找原因了。

10月18日，柴泽民（他的具体职务我忘记了，二三十年后做过驻美大使）讲土改的方法与步骤，关于向群众宣传政策，他说，一定要到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以后，再交代具体政策，“否则会使群众缩手缩脚”。这就是说，先要让群众放开手脚，然后再用具体政策去规范他们的行动。10月21日，李维汉在欢送大会上讲话，是以预见到运动会出现过火偏向为前提的，他给我们打预防针说：“纠正过火偏向，一定要在自己人当中进行，不可在地主面前泼农民的冷水，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限制农民的口号切不可提。”这是与毛泽东历来主张运动初期要反右、运动后期再纠偏的精神一致的。柴泽民回答问题时说：“群众发动起来，在气愤的情况下，打了几下地主，不算错误；但唆使群众这样做，就不合乎政策了。”李维汉强调：“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任何和平土改的设想都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在领导层决策层，是否有人设想和平土改，我不知道；但在基层干部中，为了免于犯“和平土改”的右倾错误，斗起来不怕激烈，不怕过火，也是自然的了。

许多年后，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命题，把利用群众自发的暴力倾向达到政治目的的战略战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后来的“文革”的确是史无前例，“文革”中“红卫兵”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岂是我们40年代闹学潮的学生可比。我们那时候闹的学潮，从“抗议美军暴行”到“反饥饿反内战”，虽说也叫群众运动，一是规模较小，一是止于政治抗议的性质，而且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见好就收，然而也正因此，从地下党学运的领导角度看，他们运筹帷幄是煞费苦心的，而从像我这样的一般参与者来说，似乎要简单些。土地改革是一场农民运动，不仅是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复杂多端，对我这样的“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环境人事完全是陌生的，做工作队员虽说上有领导，但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相对于参加运动的普通农民，我们处在主导的方面，我不能不预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10月25日，在志愿军入朝一周年之际，登上火车出发前往西北，我的心情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

头一站到西安，停下几天听当地领导的报告。在这之前，已经学习过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习仲勋以及马明方在1950年有关西北工作情况，特别是有关西北和陕西省土改工作计划和任务的报告等文件。我们将去甘肃，西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一位姓韩的副主任布置，甘肃除蒙藏聚居的非纯农业区及庆阳专区外，65个县市、780万人口要在今年秋后进行土改。

在西安，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人受到很高的礼遇。不过，当时的西安古城市区还没有什么新建设，我们大队人马分住在一些私营旅馆，我住的叫大金台旅社，傍晚先听到乌鸦聒噪，仰头看去，密匝匝一片乌鸦转着圈儿飞，像是谁用马杓搅着一大锅黏粥。“白天开会，晚上看戏”，几乎是老规矩，看了易俗社演的秦腔，戏园子里两厢拉起绳儿卖站票，西安人真迷那高亢苍凉的腔调。另一晚看了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原名《库班哥萨克》），我们都被影片中苏联集体农庄一派歌舞升平所陶醉，心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土改就是要为中国农民创造走向同样幸福的生活开辟道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斯大林最爱看这部片子，在苏联农业一片凋敝的年月，他也用这粉饰生活的电影来陶醉自己。

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谁养活谁》，这跟南方流行的《啥人养活啥人》（叶至诚词）异曲同工：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刨，全是咱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咱们出力量。
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谁养活谁呀，事情很明显，地主们吃穿，哪样不是靠着咱？土地改革，改善生活理当然。有了吃，有了穿，组织起来不费难。咱们把身翻，胜利在眼前呀在眼前。

这首歌不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也启发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它印证了我们在别处学习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为起点，这是不错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劳心与劳力的区别导致了生产成果分配的差别，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平等。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此否认社会分工的必要。从理论上是这样讲，宣传中却难免没有简单化的倾向，发展到极端，就如60年代“文革”中，江青口口声声责问文艺工作者：你们吃农民种的粮食，穿工人织的布，如何如何，云云云云，撇开江青本人穷奢极侈的伪善不说，能够不问青红皂白一笔抹煞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么，能够说脑力劳动的价值低于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价值，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就因“不事生产”而在人格上比工人农民低一头，甚至“肮脏得多”吗？

这都是今天人们在比较正常的气氛下公认的常识和常理。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记得当年，柴泽民在解答划阶级成份的问题时，就说，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因为不是农业劳动，不能计入家庭劳动；家中有无劳动，须视家中有无农业劳动而定。虽说是解答问题，其实带有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的性质。这样实施的结果，比如一个农家有一个成年人没在家里种地，而是在外做教师，计算他家有无劳动时，这个人教书的工作就不被承认为劳动了。我后来入驻的那乡那村，都没有出外当教员的，但又过了十几年我参加河南浚县“四清”运动时，所在西宋庄大队有一户地主，就是土改时在城里教书的；因为教书不是农业劳动（何况必须是参加主要劳动才算是“有劳动”），他家划为地主，然后在学校搞运动时，又因他家已划地主而将他清洗回乡，于是他就顶着地主帽子受专政，服劳役，好像偌大中国不稀罕一个小学校教师，但汲汲于增添一名地主。这仅仅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吗？

我们接着从西安出发，那时候铁路才修还没修通，只能走西（安）兰（州）公路，经过平凉、泾川，因是敞篷卡车，盘旋而上过六盘山时，11月初的高寒

天气，加之“红旗漫卷西风”，凉彻骨髓，挤得两腿发麻，下山才得活动活动半僵的腿脚。又过了定西，见路边的田野上一块块都被砂石所覆盖，这是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原来此地天旱，为了保墒，在耕地表面匀匀铺上一层卵石，这笔投资不小，但效益不错，头十几年是新砂，再十几年是中砂，三十年左右就是老砂，产量递减，不重新铺砂就不行了，故云：“铺死老子，吃死儿子，饿死孙子。”既佩服此地农民“与天斗，与地斗”的智慧招数，又为当地“得天独薄”而叹息。在黄河边看到大水车，在黄河里乘了羊皮筏，逛五峰公园觉得一般，入城歇脚在西北大厦，楼高三层，据说曾是张治中驻节所在，至今为全城的制高点。香烟牌子“八二六”，因为兰州是1949年的8月26日解放的。看兰州市容，该和两年前没大变样。中心建筑鼓楼还有人半公开地兜售“春官”。一切都展示着迫切需要一场荡涤污垢的社会改革。在这样背景下，土改的历史意义更显得突出了，我想。

我所在的西北土改工作团一团，在兰州又分了队，我属皋兰工作队。11月5日在兰州听了甘肃省省委书记的报告，11月10日在皋兰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这个县北邻景泰，西邻永登，东邻靖远，东南隔黄河与榆中为邻，而南面紧挨着兰州（几十年后它已划为兰州的一个区）。我们工作队分赴皋兰的源泰区和水川区。我向来喜欢从乡村地名琢磨它的地理内涵和历史内涵，这两个区有些地名标志出地形和气候的特点，像上黄克浪、下白坡子、冰川子、石竹沟、羊头峁子、黑石川、青石墩、大横路，还有三川口、后长川、金钩口，至于王家峁、何家川、刘家窑、乐家铺之类，就比较一般了。

县委书记的报告，介绍了本县的基本情况，地主的主要剥削方式，农民从解放前至今的生存状态，土改摸底和试点经验，尤其是把将要进行的土改，按照七十天左右的预期，详细地分了阶段，哪个阶段抓什么，怎么抓，布置得十分具体，使我悬着的心一下落地，只要照方抓药，就能完成任务；我从心眼里佩服县乡两级干部的驾轻就熟，成竹在胸。越往下走，越感到放心，11月15日在金口村的水川区公所听到的报告就更具体了。

水川区靠黄河边，黄河边还有白杨树，这是全县的好地方（往北去，有个北山区，整个区没有一棵树，简直难以想象）。全区共九个乡（当时的乡即行政

村，相当于公社时期的大队，下面还有自然村，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一乡蒋家湾，二乡桦皮川，三乡博爱村，四乡金沟口，五乡白茨滩，六乡大川渡，七乡鹦哥湾，八乡麦地沟，九乡聂家窑。各乡政府距区政府最远40里，其他二三十里不等。全区2363户，14653人，土地55781亩3分5厘（算计得如此精确？可能吗？有必要吗？）；全区每人平均土地3亩8分5厘8毫（原来是要这个平均数）。全区贫农1687户，中农535户，富农44户，地主65户，雇农及其他职业者32户。今春各村都经过了减租、反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工作，但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在“减租”中各乡都组织与扩大了农会、民兵，五个乡成立了妇联，但不健全，妇女工作最差。

真要感谢当地基层干部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如果本是空白，我们两眼一抹黑地进村，那将多么艰难。有这个基础就不同了。实际上，我们即使不来，人家也还不是照样干，看来，我们来这儿，主要是像多次报告中说的，让我们这些光有书本知识的人好好见一下世面罢了。

说到社会情况，说是一、四、六、七乡比较复杂；但论工作基础——减租结束时的群众基础，四、六、七乡较好。这时我庆幸我分在五乡，不止因为它有个好听的名儿白茨滩；更因为，它虽不在工作基础较好之列，但社会情况并不那么复杂，我的避难求易的惰性在这里显出来了。可见我绝不属于那路哪里困难就要求奔赴哪里的英雄好汉，也不属于希望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积极分子。

白茨滩乡的土改顺利完成

听了介绍，看来五乡白茨滩处于中间状态：减租中未充分发动；捐献（飞机大炮）和征粮中表现不错。减租时本乡未大斗，目前问题不大。减租快完时斗了恶霸滕尚镇，“果实”未退完。226户，1440人，农业人口1430人，土地4256.27亩，每人平均2.98亩。地主8户，富农2户，中农58户，贫农104户，雇农27户。乡长张守家为贫农，农会主任曾富河为雇农。

这时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政务院的朱明，中央戏剧学院的葛崇娴，还有

我，跟三位地方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来自西固城（即后来兰州市的西固区）的雇农许尊麟，还有马、高两位，都是甘肃各地前期土改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一起搭配工作；朱明和许尊麟分任正副组长。

这个白茨滩乡星散着好几个自然村：碾子口、牛家窑、杨家沟、狄家庄，还有中坪子、洞槽子、王家堡子。我们11月16日进村，先合后分。一开始通过乡村干部会、农代会、青妇代会、农会会员大会、村民大会宣布土改，按照统一的宣传大纲，向群众宣讲政策，自然是由工作组长、副组长主持。我一进村，连当地群众说的话都听不懂，我担心我的话他们也听不明白，总是光带个耳朵不张嘴。担任副组长的老许，说起话来像拉家常，关键处却也能疾言厉色，他没有任何“书面语言”的障碍，每句话都能打到群众心里。我不觉得他是刚刚冒头的土改积极分子，他倒像是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干部。

工作组跟群众见过面，就分头下各村去摸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每天早晨或晚上集中“斗（凑）”情况，大约个把星期，认了门，我们就分别住到贫雇农家，也不天天碰头了。我住在牛家窑的时候多，同住而不同吃，当地干部把我们的三顿饭，分别派到中农乃至上中农家里，据说这样可以使他们安心，于是差不多天天是热腾腾的“臊子面”，白面条，黄色的酸菜，浇上红色的辣子，有时还有肉末。其实主要是贫雇农家拿不出像样的饭食。后来熟了，我要求贫农家别见外，我较长期地在牛礼垣家吃派饭，他家大婶从早到晚坐在织布机前，而一冬天仍只穿一条黑布单裤。她家七岁的麻脸小姑娘，总是到“饭时”就来怯怯地叫：“邵家哥！”我到雇农牛喜田的窑里住过两夜，炕上连一领草席也没有，他怕我冷，多加了柴火，让我睡热炕头，我把一件日本军大衣连铺带盖，一侧身就烫一下子，简直像是烙饼，一夜翻过来掉过去，后来还是搬出去了；他一个光棍汉，自己饥一顿饱一顿，又哪管得了我的饭？除了吃住，我又尝试以别的方式联系群众，晚饭后开片儿会，总要等人，趁这空档跟大家闲说话儿，顺手借过他们的水烟袋，想试吸一口，谁知不留神咽下一口烟油子，登时的反应是呕吐，老乡们掀开我的棉袄，在后背上连划带拍，最后放我躺在炕上，迷迷糊糊，仿佛喝醉酒似的，会众搭搭讪讪地散去。

很长一段时间，走村串门，总是老许带着我。冬闲，下午太阳照着，到谁

家去，都拿出一筐箩干枣儿，随抓随吃随聊天。老许真有办法，吃着聊着，便把村里村外人们之间的故事、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家长里短性质的过节儿，弄得一清二楚。少不了临走还吃上半碗炒面拌“冬果梨”，有冰淇淋之味。老许口无遮拦，有时骂骂咧咧，最常挂口头的是“日他哥”，但越是这样，群众越喜欢他，我虽不是“格格不入”，他才能算“打成一片”。自然，有阶级的分野，地主不喜欢他，甚至怕他。有地主在背后说：“怕那黑脸的，不怕那白脸的。”黑脸指老许，白脸的就是我。因为他见了地主能大声吼，吓得他们三魂出窍，一样的政策，从他嘴里讲出来，显得有份量，有权威。因此，老许走到哪儿都是理直气壮，很有“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气魄。

但我发现，不是所有的贫雇农都像老许这样。比如全乡的农会主任曾富河，地道的雇农，但不善言词，肉肉乎乎的，凡是开会，都由乡长张守家出面讲话，老曾不讲话，可他在贫雇农里人缘好，连他有一份“私情”的事大家也心照不宣，好像都给予同情的理解，这一度让我大惑不解。看来农民自有其现实主义眼光，对老曾确是看“大节”，看“本质”，那就是为人实在、可靠，这是群众推举带头人时最重视的。农会主任，这在土改时可是重要的岗位，在没有建党的地方，他们就是农民的领袖，运动的领袖，举足轻重；建立了党支部的乡，挂“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两块牌子，党支部不挂牌子——这当然不表明党支部不重要，而只是沿袭一些地下活动或解放初期的传统，党的活动还处于半秘密状态，至少保持了一些神秘色彩；就像50年代从来没有任何人以党组书记或党组成员的身份公开出场，即使他们兼任国家机关的部长、局长，群众团体的主席、书记处书记，也总是以行政职务抛头露面，直到“文革”以后，党组书记一职才在新闻媒体频频亮相，报道一些“党政一肩挑”部门负责人时，也往往先报他的党组书记头衔了。现在到农村，看不到农民协会的牌子，不是农会代替党支部“退居幕后”，而是土改结束后农会就偃旗息鼓，60年代“四清”运动中另外组建了“贫协”，全称“贫下中农协会”，也曾一度貌似乡村里的权力机关，运动过后，又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土改虽然分了土地，中农贫农的差别还在，但因不许雇工，雇农是没有了；随后在合作化运动中，就不再提贫雇农，而是把中农划分“上”“下”两片，上